红花

周刊

8 长江日报

2026年10月14日 星期三

主编:周 璐 美编:职文胜

版式:洪菊华 责校:郑德衡

用文字留住长征

周璐

读邱德昌的《生命等高线》,我和同事沉默了很久。那些故事太重了。重到你读完一时说不出话,重到你觉得轻飘飘的日常忽然有些站不稳。

讲解员钟鸣讲了一个故事。塘背村的老农罗云然把六个儿子一个个送上征兵线。前四个已经牺牲在战场上,他又把最后两个领到桥头。区苏维埃主席劝他留一个在身边,老人说:“没有苏维埃就没有他们啊!就是断了香火,也要跟着红军干革命。”

他又讲了一个。中复村的钟根基和16位伙伴参军时,一起跪在河卵石上发誓:谁要活着回来,谁就替牺牲的兄弟为爹娘养老送终。后来,17个人里回来他一个。他给16位兄弟的父母送吃送衣、看病送医、抬棺送葬,当了30多年“扛丧子”,打了一辈子光棍。

还有一个。赖二妹等了丈夫钟奋然近30年,每年给他做一套新衣裳、一双新鞋,最后等来一张烈士证。她把30套衣裳鞋子放进衣冠冢,继续坐在门槛上,望着门外的山坡。

这几个真实的故事,让长征从一个历史事件,变成了一群活生生的人。如果只看地图上的箭头、部队的番号、战役的规模,长征就成了一部军事教科书。让长征走进人心的,是罗云然在桥头送走儿子时的眼神,是钟根基跪在河卵石上发下的誓言,是赖二妹每年做一套新衣裳时手指上的针眼。

这也是我们副刊今天为什么要做长征的缘由。

史诗不止有一种写法。军事史写的是决策、路线、战役,文学写的是人,写的是让人心里一动的细节。这些,铺就了长征坚实温暖的底色。

长征过去90年了,当年的亲历者正在一个一个离开。如果他们带走了这些故事,我们剩下的就只有地图上的箭头和档案里的数字。文学能做的,就是趁现在还来得及,把这些人、这些事、这些细节记下来,让后来的人知道,长征不只是走出来的,更是一个个普通人的选择决定的。

所以,副刊做长征,做的不是历史学的长征,也不是军事学的长征。文学的力量,不在于它能记录多少事实,而在于它能留住多少瞬间。

这些普通人为什么愿意争相跨过那道“生命等高线”?因为他们相信,红军是穷人的队伍,苏维埃是替百姓做主的政权。党的主张,就这样变成了一个个普通人自发的选择。这些选择汇聚起来,就是改变中国命运的力量。

从长汀到遵义,从出发到转折。1935年1月,遵义那间27平方米的会议室里,党在绝境中完成了一次自我纠错,重新校准了方向。而支撑这次转折的,正是长征路上无数个罗云然、钟根基、赖二妹用牺牲和坚守换来的时间与空间。

那些选择,就是历史的底子。每一个选择的背后,都有党的引领,都有信仰的支撑,都有代价,都有重量。

编完这两篇稿子,我想起钟鸣说的那句话:那道等高线,量的是身高,也不只是身高。跨过那道线的人,绝大多数再也没有回来。可他们的故事,被记下来了,被讲出来了,被传开了。



红军桥(油画) 袁文彬 作

站在遵义会议会址

谢克强

这是我第二次来到遵义,再次伫立在这座因一场会议而改写中国命运的小城。

上一次途经遵义,步履匆匆,抵达遵义会议会址时,场馆仅剩二十分钟就要闭馆。我仓促走进那间闻名天下的小会议室,只能短暂伫立、默然凝望,来不及细细端详一室风物,也来不及静静沉淀心底感慨。满心的仓促与遗憾,让我在转身离开时悄悄许下诺言:遵义,我一定会再来。我要在从容静谧的时光里,好好读懂这方寸小楼里藏着的峥嵘过往,读懂那场绝境翻盘的伟大转折。

机缘相宜,时隔不久,我终于有机会重回遵义,赴这场迟来的静心之约。

我所居住的酒店就在遵义老城,与会址咫尺相望。老城街巷古朴安然,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温润发亮,街巷间的烟火清淡而安稳。缓步穿行其间,心绪慢慢沉静。抬眼望去,不远处一栋青砖黛瓦、中西合璧的两层砖木小楼,安静矗立在闹市深处。门楣上“遵义会议会址”六个鎏金大字,庄重沉稳,在天光里熠熠生辉,有种穿透岁月的肃穆与凛然。

拾级而上,踩着咯吱轻响的老旧木梯,脚步不由自主放得极轻,生怕惊扰了这屋舍沉淀的百年光阴,惊扰九十余年前,在这里激荡交锋的思想风雷、关乎国运的激烈辩论。

行前翻阅史料,方知眼前每一件旧物的来之不易。

我知道,此刻,这些饱经风霜的老物件,静静陈列在二楼的会议室中。它们不语不言,却是最忠实的时光见证,日复一日,向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参观者,娓娓诉说一九三五年那个寒冬,一段山河飘摇、绝境求生、拨乱反正的滚烫历史。

此刻,我就站在这间仅二十七平方米的会议室门前。目光落在一室原貌复原的陈设,内心翻涌着深深的震撼与敬畏。谁能想到,就是这样一间朴素寻常的私家小客厅,曾聚拢起一群胸怀家国、信仰如炬的革命者。谁能想到,就是这方寸斗室,承载了中国革命最危急时的命运抉择,上演了一场扭转乾坤、开创新局的历史巨变。

一室格局简洁规整,完全依照当年原貌修复留存。墙面是柔和素雅的米白色,历经近百年风雨侵蚀,虽有淡淡斑驳,依旧端正肃穆。屋子正中,那张标志性的长条木桌沉稳矗立,通体板栗土漆色,桌面经年摩挲,凝出一层温润厚重的包浆。桌沿呈鱼背弧线,边角衔接处是简约雅致的方宝瓶式雕饰。长桌四周整齐环绕着木边藤心折叠座椅,古朴简约。桌侧静静摆放的木炭火盆,让人瞬间梦回一九三五年初——彼时黔北霜风刺骨、寒气逼人,正是这火盆里跳动的炭火,驱散了一室严寒,温暖了一群在绝境中苦苦求索前路的革命者。东壁墙上悬挂的老式木制自鸣摆钟,钟摆沉静,嘀嗒有声。九十余年前,正是在这沉稳不息的钟鸣里,会议整整持续了三天。

方寸陋室,容纳千秋国运;一室旧物,承载万里征程。

翻阅与会者伍修权的回忆文字,当年参会的二十位革命者名单清晰可溯:政治局委员毛泽东、张闻天、周恩来、朱德、陈云、博古;候补委员王稼祥、刘少奇、邓发、何克全(凯丰);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、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。会议扩大至军团级指挥员。邓小平最初以《红星报》主编身份列席,会议期间当选党中央秘书长,正式参与会议全程;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与翻译伍修权全程列席。

二十位心怀信仰、身负使命的共产党人,从战火前线、指挥岗位奔赴而来,聚于小小一室,共临危局、共破困厄、共商救国大计。

凝视眼前错落安放的座椅,我不禁遐想当年会场座次排布。讲解员的解说,让这段历史变得愈发立体可感。会议由时任党中央总负责人的博古主持,端坐长桌正中,周恩来紧邻博古落座,毛泽东坐于长桌一侧,王稼祥、张闻天分列左右,毛泽东、王稼祥、张闻天三人思想相通、立场一致。与众人围桌议事截然不同,李德坐在会议室门口一隅,伍修权坐于其侧。这略显疏离孤立的座次,恰是他彼时处境的真实写照:脱离中国革命实际、脱离红军战场实践、脱离一线将士真实境遇,最终陷入教条僵化、孤立被动的局面。

此前数年,党内“左”倾教条主义路线占据主导,博古、李德脱离实际、照搬外国军事教条,直接导致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彻底失利。红军被迫放弃中央苏区,开启悲壮的战略转移。长征初期,错误指挥未能及时纠正,红军一路被动挨打、节节受挫,湘江一役更是元气大伤,八万余红军将士锐减至三万余,革命陷入濒临覆灭的绝境。

就是在这样风雨飘摇、前路未卜的危急关头,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紧急召开,抱着自我纠错、绝境求生、重开前路的信念,开启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深刻自省与伟大转折。

会议首先审视了以黔北为中心创建根据地的战略部署,最终采纳刘伯承、聂荣臻等前线将领的建议,决定北渡长江,与红四方面军会合。

接着,会议进入核心主题:全面总结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利与西征初期军事指挥的经验教训。

会议伊始,博古代表党中央作第五次反“围剿”总结报告,虽作了检讨,但主要还是强调敌我兵力悬殊等客观因素,引发与会者坚决反对。随后,周恩来代表中革军委作军事工作副报告,客观剖析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的根本缘由,直指主观教条、脱离实战的军事指挥弊病,不避过失、主动担责,为整场会议的自我纠错奠定了求实求真的基调。

周恩来发言之后,会场思辨氛围愈发坦诚热烈。张闻天率先起身,发表震动全场的“反报告”,系统批判长期主导中央的错误军事路线。毛泽东发言,他结合前四次反“围剿”连战连捷的成功经验,精准概括出错误军事路线的三大表现:进攻时的冒险主义、防御时的保守主义、突围时的逃跑主义。他深入浅出阐释灵活机动、避实击虚的运动战思想,在场将领听罢豁然开朗。毛泽东发言之后,身负重伤的王稼祥强忍病痛,挣扎坐起,明确要求立即撤销博古、李德军事指挥权,恢复毛泽东对红军的军事领导。

朱德、彭德怀、刘伯承、聂荣臻等前线将领,结合亲身浴血奋战的经历,一致坚定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务实军事路线。

真理越辩越明。凯丰当众偏执辩驳,甚至轻率嘲讽毛泽东仅凭《孙子兵法》《三国演义》带兵打仗。毛泽东从容反问:“你读过《孙子兵法》吗?几章几篇?为什么我们不能学学我们的老祖宗?”

历经三天反复研讨、激烈辩论,会议最终决定:撤销博古、李德军事指挥权,从根本上终结“左”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错误统治;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;明确朱德、周恩来为红军最高军事首长,周恩来为军事指挥最后决策者,毛泽东协助统筹军事工作。

我缓缓走在这间小小的会议室里,目光轻轻拂过每一张座椅、每一寸木桌、每一件旧物。一室静谧无声,却仿佛回响着九十余年前的激烈思辨、赤诚诤言与坚定呐喊。

我深深知晓,这看似寻常的会议室,承载着中国共产党成长史上珍贵的觉醒与成熟。从此,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告别了照搬盲从、依附外部指导的被动局面,第一次真正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、观点、方法,审视和解决自身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问题,学会了直面错误、勇于纠错、自我革新、自我超越。这是政党的成熟,是思想的飞跃,更是国运的转机。

暖阳透过窗棂温柔洒落,铺满古朴桌面,一室旧物在天光里温润沉静、安然肃穆。我驻足回望这间二十七平方米的小小会议室,心中敬畏汹涌、久久难平。这里没有金戈铁马的战场轰鸣,却有坚持真理、敢于亮剑的无畏风骨;这里没有硝烟漫天的生死厮杀,却有涤荡迷雾、重塑航向的清醒格局;这里没有轰轰烈烈的盛大仪式,却有共产党人刀刃向内、自省自纠的伟大担当。

九十余载风云远去,山河换貌、岁月更新,可遵义会议沉淀的精神力量,历久弥新。实事求是、求真务实、独立自主、敢于斗争、勇于自我革命,这一串串精神密码,深深熔铸进百年大党的血脉筋骨。立此小楼,回望来路,一桌一椅皆岁月,一思一念皆初心。眼前静默的旧址旧物,默默诉说着过往峥嵘,也静静启示着当下来人:世间行路,从无一帆风顺;事业前行,难免迷雾坎坷。唯有始终立足实际、坚持真理、敢于纠错、勇于革新,方能穿越风雨、站稳脚跟、行稳致远。

谢克强:曾任《长江文艺》副主编、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

生命等高线

邱德昌

一

这是一座普通的客家古廊桥,桥下的溪水静静地汇成一潭。因为这里是红军长征最早的出发地,被誉为“红军长征第一村”,廊桥就格外引人注目了,1934年9月30日下午,红九军团将士就是从这里出发,迈出了长征第一步。

廊桥原名接龙桥,始建于明代,位于福建省长汀县南山镇中复村,红军进驻后,在此征兵并设医务点给群众治病,接龙桥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“红军桥”。桥中的四根立柱上,均刻有一道红军征兵时的身高测量线。中复村红色文化宣讲员钟鸣介绍,这叫“生命等高线”。我量了一下,等高线高150厘米,比一支汉阳造步枪高出一个头。钟鸣说,红军战士要背着长枪行军打仗,一支加刺刀的步枪将近一米五长,身高不够,枪就拖在地上,行军不便。所以这条线就是参军的硬标准。起初是用笔画的,很多人年纪小、身高不够,半夜偷偷把线描低。后来红军索性用刀刻进了柱子,这道刻痕就成了永久的征兵标准。高于这个刻度的,才可以参加红军。

桥的尽头是观寿公祠。观寿公祠门前立有石碑“红九军团长征二万五千里零公里处”。这座桥不只是征兵的地方——桥上刻着的等高线,既是起点,也是告别。跨过这道线的人,绝大多数再也没能回来。

长征出发7天之前,这座桥上还是另一番景象。

1934年9月23日,廊桥对面3公里处的松毛岭战役打响了。那天,塘背村的老农罗云然领着两个儿子前来报名参军。据钟鸣讲述,区苏维埃主席蔡信书对罗云然说:“老罗叔,您之前送来的四个儿子都已牺牲在战场上了,您就留个小儿子在身边吧!怎么又将两个娃儿送过来参军?”罗云然却说:“若不是红军来了分给我们家田地的话,孩子们早就饿死了,没有苏维埃就没有他们啊!我和这两个孩子商量好了,要跟着红军干革命!”蔡信书流着泪,紧紧握着老人的手不放,点头同意了。这两个孩子编入部队后,随即投入了松毛岭阻击战。

据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资料记载,松毛岭战斗发生于1934年9月23日至30日,是中央红军长征前在东线战场上的最后一战。红军将士浴血奋战七昼夜,以伤亡近半的代价,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赢得了宝贵的时间。那场阻击战,国共双方都投入重兵决战,共有2000多名红军战士牺牲在松毛岭上。

同在这一天,中复村的年轻人钟根基与16位伙伴到接龙桥报名参军。17位青年高矮不一,脸上尽是稚气,有的个子不够,就偷偷用力将脚尖踮了踮,都过了等高线。他们整齐地站在廊桥上,换上了军装,看到前来送行的亲人难舍难分,钟根基对伙伴们道:“咱们都跪下,给廊桥对岸的父母叩个响头,从今往后,咱们无论谁活着回来,都代替牺牲的兄弟为父母养老送终。”伙伴们跪在河卵石上,全然不顾膝盖的疼痛,异口同声道:“谁要活着回来,谁就为爹娘养老送终!”随后,钟根基带着伙伴们转身朝观寿公祠进发。百米处是关帝庙,钟根基他们没上过几天学,但庙前的一副对联他们都倒背如流:“义在汉室三分鼎,志存春秋一部书。”小伙伴们平时在关帝庙前玩游戏,最爱玩桃园三结义的故事。他们不约而同地停下脚步,齐刷刷在关帝庙前鞠了一躬,然后跑到观寿公祠前集合。

钟根基等17位年轻人中,有的牺牲在湘江岸边,有的长眠于雪山草地,到达陕北时,只剩钟根基一个人了。据钟鸣考证,整个中复村,有近2000人参加了红军,到达陕北时只剩10人,最后活着回到村里的,仅有6个人,而钟根基那一批出去的17人中,只有他活着。新中国成立那年,许多战友兴高采烈回乡团聚,他却不敢还乡,不是他的父母不在世,他实在是不知道该如何面对那些已牺牲伙伴的父母啊!他留在了部队,又参加了抗美援朝。仗,是打完了,自己最初的承诺呢?这句承诺,像老家的磨石一样,压在他的背上。他在心中无数次对自己说:回去!回到伙伴们永远回不去的故乡去!他申请转业,组织不允许。他连组织安排的工作也不要,只想回到家乡,回到最初出发的廊桥上,向16个伙伴兑现他最初的承诺:给伙伴的父母养老送终!他将自己的工资全部用在牺牲伙伴的父母身上,给他们送吃送衣,给他们看病送医,帮他们干农活。这些老人,都成了他的父母亲。作为老红军,他的津贴虽然可观,但要接济这么多老人,总是入不敷出,但他无怨无悔。

更令人惊讶的是,无论哪一位老人临终,他都要上门做孝子,给死者洗身入殓,抬棺送葬,成为一名“扛丧子”。在当地人看来,“扛丧子”干着扛丧、入殓、抬棺材等活计,是最被人看不起、最低贱的活,如此“下贱”的工作,是很难讨到媳妇的,但钟根基却毫不在意。他总是说,我能活着尽孝,就是最大的幸福。“扛丧子”,他一干就是30多年,为此,他打了一辈子光棍,收养了两个女儿。

在中复村,与钟根基同一天跨过等高线的,还有结婚才两天的赖二妹的丈夫钟奋然。赖二妹在婚后10个月产下遗腹子。她天天上山砍柴,打短工,含辛茹苦养活孩子。一有时间,她就会来到红军桥,呆立半天,与这柱子上的等高线说话。更多的时候,她就坐在自家的门槛上,痴痴地望着门外空荡荡的山坡。她相信自己的丈夫,一定会在某一天出现在山坡上。每逢过年时,她都要给杳无音信的奋然哥做一套衣裳、一双鞋子。因为她答应过奋然哥,哪怕就是等到天荒地老也要等他回来。这一等,就是近30年!1963年,县里组织派人上门,一张烈士证,击碎了她的美梦。她捧着烈士证,泪如雨下,30年了,这是她第一次等来了丈夫的音信,也第一次爆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声。第二天,她含着泪,在家门前山坡上,给丈夫修建了衣冠冢,棺材里放的是她每年给丈夫做的一套新衣裳和鞋子,一共30套!此后,她还常常坐在那门槛上,望着远处的衣冠冢,痴痴出神,有时会来到红军桥的等高线旁,喃喃自语。

二

红军桥向西5公里,是南山镇的塘背村,这里是已故开国少将罗洪标的故乡。据党史资料记载,1929年11月4日,塘背村爆发了由张赤男、罗铭领导的“塘背暴动”。才13岁的放牛娃罗洪标参加了暴动。参加红军时,他个子还够不着红军桥上那道等高线,因他在私塾读过几年书,被张赤男相中,破格获批参军并成了他的勤务兵,后来成为一名红军司号兵。1935年4月,他率部在贵州猫场执行阻击任务,在掩护军团主力转移后与部队失去联系。他流浪在贵州毕节地区长达10个月,一刻也没有放弃寻找红军。1936年2月,他终于在贵州大定县找到了组织,加入红二军团继续长征,走到了陕北,走完了自己长征路上最重要的一段。

同为塘背人、同为红军司号员的罗广茂是15岁那年参军的。那是1930年1月,红四军召开古田会议之后,率部挺进清流时,部队也在钟屋村的红军桥上宣传征兵。罗广茂个子矮,踮起脚才够上这条刻度线,成了一名司号兵。后来部队让他保管《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》。据宁化县革命纪念馆相关资料,这本号谱是全国现存唯一完整、正规出版印刷的红军军用号谱,罗广茂知道,这是军队的重要密码,得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保护好它。尽管工作调动频繁,他始终将这本号谱和号嘴随身珍藏。长征出发时,罗广茂因负重伤在长汀县四都镇红军医院治疗,苏区全部沦陷,他潜回家乡塘背村,为了躲避民团追捕,确保号谱安全,将号谱交给母亲保管,独自一人踏上了背井离乡的谋生之路。后来见风声还是很紧,他又将母亲接到宁化县乡下隐蔽。新中国成立后,罗广茂想将号谱上交,无奈母亲年事已高,想不起号谱藏在哪里,只有号嘴还在。从此,每当遇上难处时,罗广茂就拿出号嘴吹一吹,心中仍挂念那号谱。1974年,年近花甲的罗广茂再一次在家中翻找。当他翻开谷仓底时,发现有一个包裹牢牢钉在底板上。他小心翼翼地揭开,顿时热泪盈眶——那本被他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《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》,在30年后终于失而复得!他立即捐赠给了宁化县革命纪念馆。

从塘背村返回红军桥,我来到红军桥西南侧的一座老旧客家民宅。这是老红军钟根基出生时的老宅子,现已无人居住。正厅香案上挂着钟根基的照片十分醒目,在这张发黄的黑白照片上,他戴着志愿军军帽,目光炯炯。照片正对红军桥。我忽然想到,他的另一张照片也挂在红军桥上——在那里,他的目光,同样注视着那道生命等高线。

邱德昌:现为福建省龙岩市文联副主席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福建省作协主席团委员。

本社社址: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金桥大道113号新长江传媒大厦 | 邮政编码:430013 | 长报传媒集团印务分公司承印 |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:027-85888888